



COLECÇÃO CULTURA DE MACAU

澳门文化丛书

朱寿桐 / 著



NEW LITERATURE IN CHINESE AND
MACAO LITER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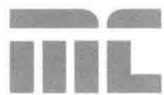
汉语新文学与 澳门文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COLECÇÃO CULTURA DE MACAU

澳门文化丛书

汉语新文学与 澳门文学

NEW LITERATURE IN CHINESE AND
MACAO LITERATURE

朱寿桐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新文学与澳门文学/朱寿桐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2

(澳门文化丛书)

ISBN 978-7-5201-2994-7

I. ①汉… II. ①朱…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 ②地方文学-文学研究-澳门 IV. ①I206 ②I209.9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1671号

· 澳门文化丛书 ·

汉语新文学与澳门文学

著 者 / 朱寿桐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王晓卿 高明秀 袁绍珊

责任编辑 / 王晓卿 李帅磊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010)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3 字 数:327千字

版 次 /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2994-7

定 价 / 8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国学大师季羨林曾说：“在中国 5000 多年的历史，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在时间上是明末清初，在地域上就是澳门。”

澳门是我国南方一个弹丸之地，因历史的风云际会，成为明清时期“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的桥头堡，并在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互动下，形成独树一帜的文化特色。

从成立伊始，澳门文化局就全力支持与澳门或中外文化交流相关的学术研究，设立学术奖励金制度，广邀中外学者参与，在 400 多年积淀下来的历史滩岸边，披沙拣金，论述澳门文化的底蕴与意义，凸显澳门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2012 年，适逢澳门文化局成立 30 周年之际，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文化局精选学术奖励金的研究成果，特别策划并资助出版“澳门文化丛书”，旨在推介研究澳门与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学术成就，以促进学术界对澳门研究的关注。

期望“澳门文化丛书”的出版，能积跬步而至千里，描绘出澳门文化的无限风光。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谨识

目 录

第一编 汉语新文学与澳门文学的重新认知

第一章 汉语新文学与学术空间的拓展 / 3

- 一 面向古典文学的“中国”理解 / 8
- 二 面向世界文学的汉语语种 / 15
- 三 汉语新文学研究的语言维度 / 18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空间与汉语新文学的学术可能性 / 28

- 一 面向现代文学的“中国”认知 / 28
- 二 历史与美学意义上的“现代”新解 / 33
- 三 学术与理论中的“文学”重释 / 37
- 四 汉语新文学：一种文学范围的学术呈现 / 41

第三章 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性意义与澳门文学 / 49

- 一 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性 / 49
- 二 汉语新文学的地域性板块 / 60



三 汉语新文学板块与澳门文学 / 65

四 澳门身份与澳门文学 / 75

第四章 汉语新文学与澳门文学层次 / 82

一 实有与空无层次的辩证 / 82

二 一般与特色层次的论证 / 87

三 优质与劣势层次的寻证 / 90

第二编 汉语新文学视阈中的澳门意象

第五章 澳门作为他者的意义 / 97

一 澳门学与澳门文学 / 97

二 汉语文学的东方城邦文化形态 / 102

第六章 澳门文学与澳门学 / 112

一 澳门学视阈中的澳门文学 / 112

二 内地、香港与海外书写中的澳门角色 / 122

第七章 澳门历史文学、民间文学与口传文学 / 138

一 文学与历史的共同话题 / 138

二 口述历史与文学的史学价值 / 140

三 口述历史与口传历史 / 142

四 新民间文化：文侠小说 / 144

第三编 澳门文学对汉语新文学的贡献

第八章 文化热土的副刊文学效应 / 151

一 生机盎然的副刊文化 / 151

二 副刊文化与澳门文学格局 / 153

三 澳门副刊文学的文化意义 / 158

第九章 澳门新诗及相关研究的学术反思 / 163

一 澳门诗歌的历史形态及其研究 / 163

二 澳门汉语诗歌的文化生态及其学术要求 / 168

三 “行吟者”陶里与他的诗 / 173

四 庄文永的诗歌与评论 / 176

五 澳门汉语新诗研究的可能性 / 179

第十章 港澳《当代诗坛》与汉语新诗 / 181

一 《当代诗坛》与汉语新诗 / 181

二 《当代诗坛》与汉语诗性 / 187

三 汉语新诗与傅天虹的文学身份 / 194

第十一章 澳门戏剧及其研究现状 / 201

一 澳门戏剧与澳门文化生活 / 201

二 土生土语话剧对汉语戏剧的理论启迪 / 203

三 澳门戏剧研究的混成结构 / 209

四 澳门戏剧研究的学科性建设 / 212

第十二章 澳门文学与澳门演艺文化的热与力 / 214

一 生生不息的活力 / 214

二 深厚丰绰的定力 / 216

三 多种途径的贡献 / 219

第十三章 澳门文学理论批评的学术贡献 / 222

一 李鹏翥的文学理论与澳门文学理念 / 222



- 二 李观鼎对澳门文学的贡献 / 228
- 三 澳门文学评论的新进展 / 232
- 四 澳门文学研究的新视镜 / 237
- 五 澳门文学评论的学术建树 / 253
- 六 澳门文学评论传统的建构 / 265

第四编 汉语新文学格局中的澳门文学事业

第十四章 澳门文学文献工作的汉语新文学意义 / 271

- 一 汉语新文学视野与澳门文学文献整理 / 271
- 二 汉语新文学概念与澳门文学文献建设 / 273
- 三 “澳港台”提法与汉语新文学的文献格局 / 278

第十五章 澳门文学事业与文学热土效应 / 288

- 一 依然是文学热土 / 289
- 二 浮出汉语新文学的地表 / 294
- 三 澳门文学观念与体制的调整 / 300

第十六章 澳门文学馆建设之于汉语新文学的意义 / 306

- 一 澳门文学馆的热议 / 306
- 二 澳门文学资料整理与澳门文学馆的建设 / 310
- 三 澳门文学馆与澳门作家研究 / 316

第十七章 澳门文学编年研究的学术启示 / 330

- 一 “澳门文学编年史”的立项 / 330
- 二 张建华总结澳门文学的“现代时期” / 335
- 三 古远清解剖澳门文学格局的形成期 / 342
- 四 傅天虹、梁笑梅等把脉澳门文学的自觉时代 / 350

第一编

汉语新文学与澳门文学的重新认知

第一章 汉语新文学与学术空间的拓展

从2007年开始，确切地说，应该从2004年开始，有关汉语新文学的倡言就陆续出现，并在学术界引起一定反响。事实上，汉语新文学的正式倡导肇始于澳门。黄维梁教授对此有清晰的描述：

2008年5月，澳门大学举办“汉语新文学”讲堂，在讲堂上，朱寿桐表示，应该通过“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建构来整合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等学科；这个概念“简洁而准确”，有学科、学术整体统一之效。朱氏认为，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新文学，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台湾、香港、澳门等其他区域，以至在别的国家，所构成的乃是整一的不可分割的“汉语新文学”。汉语作为汉语文学“共同体”的划分依据，“既能显示出新文学传统的本质力量，又能克服由于国族分别或政治疏隔对汉语新文学加以人为割裂的现实难题”。朱寿桐是讲堂的发起人，在开讲仪式上作了《汉语新文学概念建构的理论优势与实践价值》的报告。在此之前，4月份在布拉迪斯拉瓦—维也纳召开的“以文会友——世界汉学家会议”上，也作过主题相近的报告。^①

^① 黄维梁：《“汉语新文学”的正名论和学术实践》，《澳门理工学报》2013年第4期。



“汉语新文学”概念当然不是笔者一个人的倡言，类似的声音还约而同地发自陈国恩、郝明工等教授。但在澳门讨论得最为热闹，这是不争的事实。不少学者积极响应，如澳门科技大学教授、著名文学史家汪应果，认为汉语新文学概念区别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坚持普世的审美观、价值观”，而疏离了所谓“‘中国式’的标准”。而这一价值观在他看来就是“坚持‘人的文学’的批评标准”^①。尽管汉语新文学的概念并不仅仅是坚持“普世价值”，甚至主要不是为了宣扬和落实这种“普世价值”，但汪应果教授的理解无疑是深刻的，也确实说到了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实质性的亮点。著名诗学家吕进教授指出：

汉语新文学的提出，绝不止于对编写文学史具有学术意义，它更是方法论的一个突破，而方法论的每一次提升都会给学术和学科的发展带来启示和生机，为学术和学科的推进展现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

在这样的意义上，他认为汉语新文学从空间上打通了全世界的汉语文学的写作。^②

著名诗人傅天虹是汉语新文学概念最坚决的支持者和最坚定的阐释者。这位由香港长期居留澳门的诗人和诗评家，善于以一个文学教授的眼光看待“汉语新文学”，并从他所熟悉的诗歌出发，对汉语新诗的发展状况做了系列阐述。他认为“汉语新诗”概念的提出直接得自汉语新文学：

① 汪应果：《浅议“汉语新文学”的价值取向》，载朱寿桐主编《“汉语新文学”倡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② 吕进等：《汉语新文学的“外国群落”》，载朱寿桐主编《“汉语新文学”倡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从朱寿桐提出的“汉语新文学”概念中，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汉语新诗”这一概念，它有助于整合汉语新诗的创作和理论领域，建构统一中国现当代诗歌、中国台港澳诗歌以及海外华文诗歌（当然是指新诗）的汉语新诗学。^①

这些年来，傅天虹教授一直围绕着“汉语新诗”这一概念展开自己的学术思考和学术论证，并且主编了“汉语新诗文库”，可谓成绩斐然。

陈国恩教授早就注意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些学者，呼吁把海外新移民文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研究。他们认为海外移民文学有许多在中国大陆发表，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创作观念，它们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没有多大区别，如果将之排除在外，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将是不完整的”。在这样的意义上，与其将海外移民文学的写作强制性地“纳入”“中国”文学范围，还不如将势必需要扩大其涵盖范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改称为“汉语新文学”。^②这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来的非常有说服力的论证。沿着这样的思路，笔者更提出汉语新文学的文化伦理问题。将海外华文文学（不仅仅是新移民文学，也不仅仅是在中国大陆发表的海外移民文学）纳入广泛意义上的汉语新文学，不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来说，是将它的范围更加“完整”了，更重要的是，这是最符合文化伦理的。如果我们将海外的华文写作——实际上是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密切相关的一种离散写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种空间意义上的自然延伸——全部从“中国现当代文学”范畴内清除出去，将它们视为化外，我们是不是犯了文化伦理上的错误？

① 傅天虹：《“汉语新诗”概念与视野重建》，载朱寿桐主编《“汉语新文学”倡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② 陈国恩：《“汉语新文学”的功能优势及研究方法》，载朱寿桐主编《“汉语新文学”倡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我们有权力严格按照国家所属划分作家和诗人，并以这样的划分来界定我们的研究范围和文学史范畴，但在行使这种权力的时候，是否会对于愿意认同故国文化并愿意在故国文化的园地里贡献自己的诗学园艺的诗人们的文化心理造成某种挫折感甚至伤害？如果我们用汉语及类似的语言文化作为一种有效的识别系统，对来自不同地域但依托一种文化，操使一种语言的文学家进行更加宽概的定位，也许会冒着为国族主义者所谴责或质疑的危险，但不言而喻会获得一种文化伦理上的支持。^①

这就是汉语新文学概念背后非常深刻的文化伦理要义。

当然也有学者秉持质疑，包括在汉语新文学讨论的现场，不少学者从各个方面提出了一些疑问。但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不安于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等现成概念的使用，在各种学术发言的场合总是试图通过其他概念来表述上述现成概念能指与所指的内容。这在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学史研究领域已经体现为一种学术趋势，在各个层次的文学教育学科范畴内也出现了相应调整的势头。著名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一直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之外的华文文学所困扰，他呼吁编撰一本只要是使用汉语书写的都可纳入其中的文学史著作，他希望能是汉语新文学史，不过他承认，这是在他还没有知晓“汉语新文学”概念之前的困扰。他表示将会认真对待汉语新文学概念。^②

斯洛伐克著名汉学家马立安·高利克（Marian Galik）提出了“作为跨文学共同体的汉语新文学”^③（New Chinese Literature as an Interliterary

① 朱寿桐：《汉语新文学的文化伦理意义》，载朱寿桐主编《“汉语新文学”倡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② 顾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内涵：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载朱寿桐主编《“汉语新文学”倡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③ 高利克：《作为跨文学共同体的汉语新文学》，载朱寿桐主编《“汉语新文学”倡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Community) 的概念。他以比较的视野、充实的例证、比较的方法宏观地梳理了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 从中发现不同阶段的中国文学与中国以外的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式, 既有向心力式的发展模式, 也有离心力式的发展模式。这个共同体的最大特点在于: 如果没有出于政治原因的摩擦甚至相互攻击和诋毁, 这个共同体就完成不了跨文学的进程。在此基础上, 他提出了跨文学性 (interliterariness), 并论证了文学全球化时代研究跨文学 (interliterature) 和跨文学性的必要性。

如何将海外华文文学纳入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并进行一体化的学术处理, 这确乎是许多文学研究者面临的学术困扰。汉语新文学是解决这一困扰的重要途径之一, 另外也可能有其他途径, 例如, 王德威、史书美等学者提出了“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从关切“离散中国人”的写作这一角度而言, 这一概念无疑是有效的, 但它采用了“语系”这一相当复杂的术语, 而且仍然使用“华语”这一可能引起更多争议的词语。^① 因为在一般理解中, 华语、华文之所以容易造成纷扰, 是因为它应包含中华民族各种语言, 而我们通常所面对的仅仅是华文、华语中的汉语, 华语语系似乎更应该对汉语以外的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负起责任。事实上, 我们的研究者很难负起这样的责任。于是, 作为概念, 汉语新文学仍然是最简捷明快, 同时也是有最少学术争议的。

汉语文学作为趋向于稳定的学术概念和学科概念, 其自身的科学性仍处在不断的探讨和论证之中。固然, 倾向于认同和使用汉语文学概念并不意味着就此放弃诸如中国文学这样明确标示文学的国族领属关系的传统概念, 然而, 较之中国文学之类的传统表述, 汉语文学确实具有内涵更为精准、概括力更强且指涉范围更广的学理优势。如果将汉语文学及其相应概念汉语新文学, 置于与中国传统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以及

① 史书美:《反离散: 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 载施仲谋《百川汇海——文史译新探》,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2013。

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和关系中进行不同维度的学术审视，就更能凸显出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学术论域中所具有的理论内涵和强度。

一 面向古典文学的“中国”理解

毋庸讳言，汉语新文学就是要弱化国家概念，强调各地区文学在汉语平台上的共通性。同时，正如笔者在《论汉语新文学的文化归宿感》^①一文所阐述的，汉语新文学概念在省略了国家概念以后并没有削弱“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无论是什么地区的汉语文学，在文化归宿感上都会归向于中国，这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承载地，也是中华文化历史的主要形成地带。汉语新文学作为概念，表面上看起来没有涉及中国，但它不仅没有弱化“中国”意识，甚至对“中国”意识有所强化。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之类的概念还暗示着其他地区（当然主要是台湾、香港、澳门）和国家的文学还可能相对区别于“中国”现代文学，那么，汉语新文学概念表明，任何地区和国家的汉语文学，都对“中国”具有毋庸置疑的文化归宿感，至少都与汉语文化的核心地带——“中国”有着不言而喻的关系，因而“中国”意识和中国中心地位得到了更加强化的处理。

其实，“中国”作为文学史学术意义上的冠冕，其指代并非那么明确，而是富有很多争议的。这在“汉语文学”的倡导人那里表述得最为清楚。最先明确倡导“汉语文学”的是中国国学大师程千帆，他在与其弟子程章灿合著的《程氏汉语文学通史》^②中阐述了“中国”一词的历时争议。^③汉语文学史的倡言提醒人们重新关注这样一种文化常识：如果说以汉语承载的汉语文学已经存在发展了五千年，则“中国”作为完整的国族概念使用的历史，据考才始于汉代。显然，至少从逻辑

① 见朱寿桐主编《“汉语新文学”倡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② 程千帆、程章灿：《程氏汉语文学通史》，辽海出版社，1999。

③ 程千帆、程章灿：《程氏汉语文学通史》，辽海出版社，1999。



上说，将未被称为“中国”时代的文学表述为“中国文学”，显然不够严密和精准。

“中国”一词，有学者认为最初见于宝鸡出土的何尊，也有人认为在《尚书·周书·梓材》中最早出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周礼·秋官司寇》也有“反于中国”“辨其中国”之说。《诗经》中的《大雅·民劳》也有。但这些“中国”并非专有名词，多用于指“国家的中心”，是方位词。到战国时期，诸子书中的“中国”多用于概指中原一带，仍然是方位名词，而不是专用的国家名称。有时候“中国”用来指示古时华夏民族聚居的区域，即黄河南北地带，在相对于蛮夷之地的意义上使用此词。《史记·秦本纪》有“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表达的正是这样的“中国”意思。还有古人将“中国”理解为“帝王所都”之地。有学者考证，真正将我们祖国确定为“中国”，“中国”作为专有名词的国家称谓被正式认可，是在清代后期。这无疑意味着，将所有还未正式称“中国”的那些时代的文学都称为“中国文学”，显然与史实并不相符，在逻辑上也说不通。于是，程千帆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便深思熟虑地停用了习以为常的“中国文学”概念，而明智地用汉语文学取而代之。他们的学术努力表明，无论处在怎样的时代，无论生存、发展在哪一方土地的人们，只要用汉语按照古典文化的审美习惯记录、传承了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就都是汉语文学，由此形成的文学史，都是汉语文学史。

显然，我们沿用了一百多年的“中国文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并不产生于我国传统的学问体系，而是受外国学术沁入、影响或者启发的结果。在林传甲、黄人等写出《中国文学史》之类的专著之前，俄国人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早已于1880年写出了《中国文学简史纲要》，日本人古城贞吉则于1897年写出了《支那文学史》。^①

① 郭廷礼：《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洋〈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19日，第22版。